



二十世纪全纪录

1967

周丽琼 主编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
“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	1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	1
《公安 6 条》	3
“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4
“唯一能“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	4
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4
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	5
“刮他 10 级、11 级、12 级台风”	6
刘少奇夫妇被批斗	6
三个相信、三个依靠	6
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	7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	7
老干部要立新功，立新劳	9
“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9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9
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10
武汉“反革命事件”	10
江青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	11
外交部夺权事件	11
林彪：“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	11
公开点名批判 34 名所谓“走资派”	11
吴法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	12
“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	13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3
毛泽东视察的谈话纪要	14
《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14
着手筹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5
“50字建党方针”	15
毛泽东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15
“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16
《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	17
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7
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	18
陈伯达制造“冀东叛徒案”冤案	18
康生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	18
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19
毛泽东：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24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35
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109丙)通过鉴定	36
金融制度奠基人南汉宸逝世	37
孔祥熙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38
清末代皇帝溥仪逝世	55
1967年3月10日“文化大革命”临时权力机构成 立	56
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爆发	69
1967年内蒙古“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的冲突	96
小资料	108
世界部分	110
世纪回眸	110
“阿波罗”1号因火爆炸	110
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居	110

希腊发生军事政变	117
戈伊纳水库地震	117
格兰尼特、哈特兰、沃尔德荣获 1967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118
阿斯图里亚斯荣获 1967 年诺贝尔文学奖	130
《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备忘录》签署	131
1967 阿以战争爆发	131
小资料	134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

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王洪文〕(1935—1992)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工人。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

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

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

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发起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民兵暴乱。

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病死。

《公安6条》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意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唯一能“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

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刮他 10 级、11 级、12 级台风”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 10 级、11 级、12 级台风”。

刘少奇夫妇被批斗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三个相信、三个依靠

4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相信和依

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并认为“对于这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无论军队和地方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

5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向全军转发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关于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了批语。批语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时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

“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随后，这一批判延伸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到1966年初，它发展成为一场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广泛的批判运动。为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当时作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召集文化小组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但这个提纲遭到江青等人的责难。毛泽东

在听取江青等人的汇报后也对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指责。在这种背景下，5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逐条批判，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提纲，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通知》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通知》认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了进来，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通知》还提出要防备“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实际上已在暗指当时党和国家某些领导人。

“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是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196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还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

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段话是毛泽东审搞时加写的。

老干部要立新功，立新劳

《人民日报》在《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文中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即“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6月21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还对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性质、鉴别的标准及其它危害性作了论述。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所谓《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指出：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转发了毛泽东的意见：“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中央要求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制止建造毛主席塑像。

武汉“反革命事件”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江青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外交部夺权事件

7月22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林彪：“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公开点名批判 34 名所谓“走资派”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

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 21 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 34 名所谓“走资派”。

吴法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 4 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吴法宪](1915—)江西永丰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十二军第一〇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第六八五团政委。1938年10月奉命由山西挺进山东。同年底到达湖西地区，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支队政委。1940年5月奉命率部南援华中，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

1946年任辽西军区副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委。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政委，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

衔。1957年任空军政委。1965年任空军司令员。1967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1969年，参加党的九大，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

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评论员文章《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工作是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巩固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8月25日，《人民日报》又就这篇文章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指示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